

粤港澳关系的历史变迁¹

孟庆顺¹ 雷强²

(1. 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 粤港澳历史上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 英、葡占据港澳后, 三地关系逐渐变为不同国家管治的三个中国地区的关系, 政治上分隔, 但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仍很紧密。港澳回归后, 粤港澳关系走向全面融合发展的新时期。本文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三个层面论述了不同时期粤港澳关系的特点。

关键词: 粤港 粤澳 历史

一

广东、香港、澳门均处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三地为毗邻关系。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 新界地区与广东省深圳市相连, 而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 澳门半岛与广东省珠海市相接。从自然地理小区看, 港澳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成为两地与广州水上交通的主航道。香港距广州约 150 公里, 澳门距广州约 156 公里。香港、澳门两地相距 60 公里, 都具有河海港的自然地理性质。由于珠江夹带泥沙, 受地球自转的影响, 主要在珠江口西岸沉积, 澳门港口日益淤浅, 远洋轮已无法驶入, 而香港则拥有深水岸线的自然地理位置优势。

从世界自然地理区域看, 粤港澳位于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 它们都处在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交汇处, 加上亚热带的自然地理位置, 使其处于温暖多的东亚季风气候区内

广东省陆地总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1.85%, 海洋面积约 35 万平方公里, 为陆域面积的两倍。广东省陆地面积不断扩大, 主要是珠江三角洲泥沙堆积, 珠江三角洲河口湾在第四纪晚更新, 即 3.2 万年以前, 接受了东、西、北三江来沙和海相泥沙堆积而成, 在 2000 多年前, 堆积层逐渐露出水面而成为平原, 原来湾中的岛屿(山丘及台地)起平原之上。现代珠江三角洲仍不断向海渐进, 近百年间的发展速度在东江南部为 20~30 米/年, 在北江出口的万顷沙一带为 110 米/年, 在西江出口的灯笼沙一带为 174 米/年。

香港自开埠以来, 至 1995 年共填海造地 62 平方公里, 1995 年陆地面积达 1095 平方公里, 共 1997 年底仍为 1095 平方公里。

澳门土地面积在 19 世纪时为 10.28 平方公里, 其中澳门半岛 3.14 平方公里, 凼仔岛 1.67 平方公里, 路环岛 5.47 平方公里。经填海造地, 至 1994 年土地面积增加到 23.5 平方公里, 其中澳门半岛 9.1 平方公里, 凼仔岛 6.33 平方公里, 路环岛 8.07 平方公里, 这一面积维持到 1999 年。

粤港澳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远古港澳文化遗址与广东的史前遗迹大同小异。如香港深湾、蟹地湾遗址等与澳门路环黑沙遗址和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众多遗址(包括深圳大梅沙遗址、小梅沙遗址, 珠海后沙湾遗址等)一样, 大多分布在沿海或岛屿的沙堤, 出土的盘、碗、杯等文物也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秦朝开始, 港澳就成为广东的下属行政区域。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秦朝在今广东地区设立南海郡, 下设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县, 香港、澳门隶属于番禺县。东晋时, 香港、澳门划归东官(莞)郡宝安县。唐至德二年(757 年), 港澳隶属于岭南道广州都督府东莞县。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 澳

门划归新设立的香山县。明万历元年(1573年),香港划归新建的新安县管辖。自此到近代为止,除短暂一段时期外,香港基本上隶属于广东省新安县(民国时恢复古名宝安),澳门则隶属于广东省香山县。

二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粤澳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但广东地方政府仍然保持对澳门的严密管治,粤澳两地关系仍然十分紧密。政治上,广东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澳门。明代时,澳门在行政上由香山县主管。明政府还在澳门驻有提调、备倭、巡缉等“守澳官”,负责查验船舶进出口与缉捕倭寇、海盗等事宜。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添设香山县县丞一员,驻扎前山寨,作为香山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管理澳门事务。乾隆八年(1743年),清政府又将广东肇庆府同知移驻前山寨,改属广州府管辖,以加强对澳门的管理。由于有关澳门的事项均由其查察办理,因此它又被称为澳门同知。葡萄牙人每年要向广东官府缴纳地租,澳门中葡人士触犯刑律由广东各级官员审理。军事上,广东地方政府对澳门严加防范。明政府在距澳门一日之程的雍陌设有参将府,调兵千人戍守。天启元年(1621年)将参将府移至距莲花茎数里的前山,建立前山寨。清康熙年间,又在前山寨改设副将,增置左右营都司、守备,防守兵力达到两千人。经济上,澳门是明代广东对外贸易的外港,是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广东的大量物产,诸如生丝、丝绸品、瓷器和中草药等通过澳门运往南洋、欧洲、日本和墨西哥等地,葡萄牙的胡椒、苏木,日本、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马尼拉的棉花、蜂蜡等则经由澳门运入广州。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来广东的商船不得直入广州贸易,须先在澳门办理相关手续,外国商人按规定也不得在广州居住,澳门成为入粤贸易的外国商船的停泊地和在广州贸易的外商旅居地。文化上,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天主教、基督教及西方科技知识经由澳门传入广东,中国传统文化和广东地方语言也由澳门传到西方。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人。在此后不到五十年间,英国人又通过战争形式或胁迫的形式强行割占九龙,租借新界地区。葡萄牙人也利用鸦片战争后列强环视、清政府无力应付之际,逐步侵蚀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并在实际上控制了澳门的管治权。鸦片战争后,粤港澳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粤港澳同属一个行政区域的历史结束,三地关系变为不同国家管治的三个中国地区的关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港英、澳葡当局从未停止扩大其殖民利益,并屡屡得手。在反对港英、澳葡当局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压制港澳居民的斗争中,粤港澳民众相互支持,携手合作。每当英国人有侵害香港华人或广东甚至中国政府利益的行为时,从事各行业的香港华人就会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使香港经济和社会生活陷于瘫痪。广东民众也通过不同形式与港澳民众携手合作,共同反对港澳当局的侵略行为。与此同时,港澳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为中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提供了一定范围的活动舞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得到港澳民众的大力支持,但遭到广东官府的严厉镇压,港澳当局惟恐革命者的活动会鼓励当地华人的反英活动,同时为避免影响它们与中国政府及广东地方政府的的关系,在革命者的活动超出一定范围时就会严加限制。

鸦片战争后,粤港澳经济关系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兴起,澳门在广东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被香港取代,粤港关系日益密切。在19世纪后半期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以香港和澳门为基地的鸦片走私贸易和苦力贸易是影响粤港关系的两种活动。但随着香港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港英当局的经济政策也提供了有利的营商环境,香港对商家的吸引力增大。同一时期,广东频频陷入战争和动乱,广东居民大批逃入香港,富商大贾也把资金转入香港,在港开设新的店铺。香港逐步发展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地区,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直通穗港澳三地的珠江航运蒸蒸日上,广九铁路历经纷争建成通车,粤港联系更加方便。粤港两地的厂商都从扩展业务的角度主动在香港和广东投资设厂。广东厂商因香港的地理位置便

于沟通中外市场而在香港设立分号或分场，香港华商和洋商也想通过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占领内地市场。

粤港澳三地也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社会文化关系。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与广东文化交往频繁，两地文化相互影响。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广东香山人黄胜、容闳等都在澳门马礼逊学堂受过教育。广东居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仍可依照以往的传统在粤港之间自由往来，前往香港的广东居民不断增长。香港华人较早接触到西方近现代文化教育，并将新的知识传播到广东。众多的广东学子赴香港求学，吸收了现代的科技知识和民主思想。香港报纸的影响幅射到广东，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和孙中山领导、筹办的《中国日报》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清末变革大潮中，香港启蒙思想的变法维新思想对广东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派和革命派在穗港两地的论战促进了粤港的思想交流。

民国初期，粤港澳政治关系出现了较多不确定因素，使三地政府关系在 20 年代末之前一直起伏不定。在澳门，民国 10 年(1921 年)9 月发生澳葡海军开炮轰击在广东沿海缉盗剿匪的广州军政府军队的事件，次年又发生因澳葡士兵当众调戏中国妇女引起的“5·29”惨案。这两个事件都造成粤澳之间的严重对峙和广东方面对澳门的封锁，广东有关团体向广州革命政府提出收回澳门的要求。在香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得到广东政府和粤港澳两地人民的大力支持，离港返穗的香港工人均超过 10 万人，给港英当局造成了沉重打击。民国 17 年(1928 年)国民政府与葡萄牙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港英当局与广东政府官员也实现了友好互访，粤港澳关系逐步正常化。抗战爆发后，粤港澳三地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粤港澳各界人士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组织抗日救亡社团，开展抗日宣传，为国内抗日活动募捐，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广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并直接参加战斗。香港还是中国赢得国际支持的重要舆论阵地，并成为向内地输送军火和其他战时物资的一条重要渠道。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进入香港，组成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该队战士在香港居民的帮助下，到处袭击日军和汉奸，破坏日军交通运输，从日军的控制下解救了大批国内文化人，并动员了大批坚决抗日的港澳青年回广东参加抗日部队。抗战结束后，广东方面发起了收回澳门的运动，得到广东各界的广泛支持，但因种种原因这一目标未能实现。粤港方面虽在九龙城寨问题上有冲突，但合作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两地官员互访频繁，民国 37 年(1948 年)还重新勘定了界址。

粤港澳经济关系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粤港相互投资增多，一批粤港联号企业发展成为粤港两地的著名企业，如设在广东的香港联号企业先施公司、永安百货、大新百货等均成为成功经营的典范。广东设在香港的众多联号企业，在香港各个行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广东省政府还采取主动行动，吸引香港厂商赴广东投资。广东实业家因受时局动荡的影响，于抗战初期和战后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两次大规模将工厂迁徙香港，为香港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从 20 年代起，香港已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中心。广东与香港的贸易关系不断发展，两地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广东输往香港的货品除供香港本地消费的食品和土产品外，还有大量货品经香港转往外地。抗战爆发后，尤其是香港沦陷期间，澳门取代香港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中介地，外国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澳门运往广东各地，广东内地货物也络绎不绝地经澳门出口世界各地。随着粤港澳经济的发展和三地相互来往的增多，联通粤港澳的交通通讯设施也比以往完善。香港、澳门均有定期航班航行于两地与珠江三角洲的各地之间，广九铁路成为粤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澳门与广东之间建成了歧关车路，加强了两地的陆上联系。粤港金融联系也进一步加强。许多香港银行在广州开设分行，广东的金融机构也把分支机构扩展到香港。港币通用于广东各地，并一度在广东金融市场占有垄断地位。

受政局动荡的影响，粤港澳之间的人口流动在民国时期异常频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担心战火波及香港，许多港人返回广东内地。抗战初期，广东难民纷纷逃到香港和澳门。香港沦陷后，大批香港居民和难民又涌入广东。战争结束后，逃亡内地的香港居民返回香港。

中国内战爆发后，又有上百万人逃入香港。人员之间的频繁流动加快了粤港澳之间的社会文化交往。战前，粤港文化界互访增多，体育比赛频繁举行，新闻界关系密切。遇到天灾人祸时，粤港澳三地相互援助，不少香港慈善家因对家乡福利事业的贡献获得中国政府或广东省政府的嘉奖。抗战的爆发，使三地的社会文化交往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饱受战争之苦的广东难民得到港澳同胞的热情安置和救济。广东大批作家、戏剧家、教育家来到港澳，不少学校、文化团体也迁到港澳。这些内地文化人在港澳办报纸，办学校，演话剧，搞画展，组织新闻通讯社，进行抗战宣传活动，使港澳文化事业短期内出现异常繁荣的景象。抗战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在香港创办了面向华南的《正报》和《华商报》等报刊，并与民主党派合作建立了培养革命人才的达德学院，使广东进步文化在粤港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民国 36 年 (1947 年)广东水灾灾民得到港澳同胞的积极捐助。

三

建国后，由于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属于西方阵营、追随美国的英国和葡萄牙对属于东方阵营的新中国持敌视和怀疑态度，致使粤港澳关系陷于空前的低潮。

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指示对港澳实行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政策，但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惟恐新中国的革命活动蔓延到港澳，因而实施了一系列对粤港澳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港英当局采取了限制内地居民自由入境、设立边境禁区、驱逐爱国人士、解散爱国组织等措施，严重影响了广东居民进出香港的自由，加剧了边境地带的紧张局势。粤港澳之间多次发生纠纷。如港英飞机和舰艇屡屡侵犯大陆领空和水域，1952 年澳门关闸发生中葡武装冲突事件，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对广东进行骚扰和袭击，港英当局企图拆毁九龙城寨建筑物和香港中国居民的房屋等。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化了三地的紧张关系，香港“反英抗暴”活动得到广东方面的支持，导致粤港边界不断出现磨擦；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直接出面，迫使澳葡当局做出妥协。广东和港澳虽关系紧张，但从 60 年代起，粤港合作逐步增多。两地就车辆的通关问题达成一致，就遣返非法越境人员问题也达成协议，尤其是广东方面经过努力完成了东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解决了香港居民面临的食水困难。

在政治关系起伏不定的影响下，粤港澳经济关系困难重重。建国初期，港澳与内地的贸易一度有较大进展，1949 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值为 11.78 亿港元，1951 年增加到 24.67 亿港元。由于港英当局、澳葡当局追随美国实行对华“禁运”政策，港澳与内地的贸易大幅下降。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降到 1955 年的 10.8 亿港元，澳门与内地的贸易额从 1948 年的 9119 万澳门元降到 1955 年的 3408 万澳门元。此后，内地港澳贸易增长缓慢，内地与香港贸易还出现数次负增长。直到 60 年代末，内地与港澳贸易才开始稳定发展。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关系和广东关系密切，内地与港澳的进出口贸易均通过广东来进行，同时内地出口的商品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在六七十年代，澳门居民食用的绝大部分肉、菜、蛋、大米来自广东西江和北江流域，内地向香港提供的食品及牲畜占香港同类进口品的一半左右，同样主要由广东提供。内地把为港澳供应生活资料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因而尽一切可能满足港澳方面的要求，为港澳厂商与内地的交往提供方便。为满足港澳的用水需求，广东在深圳～东江建立东江供水工程，在珠海修建竹仙洞工程等。内地对港澳供应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也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为便于港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内地特委托香港中华总商会代办有关手续，使踊跃参加交易会的港商得以成行。仅 1957 年 5 月，赴广州参加交易会的港商代表就有九批共千余人。1973 年石油危机时，在港英当局要求下，中国内地立即调运一批石油供应香港。1974 年内地又以优惠价格供应香港各类石油达 30 万吨。

广东与港澳的社会交往同样在政治因素影响下陷于低潮。粤港两地居民自由往来的历史传统逐步终止，粤港澳官方往来极少。但两地社会文化交往仍在继续。在五六十年代，粤港

澳戏剧、音乐、宗教、体育团体互有往来，港澳有大批学生在广东读书。香港和澳门多次发生的天灾人祸，都得到广东方面的积极救助，反映了粤港澳之间深厚的同胞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粤港澳边界的非法越境活动外，粤港澳在社会文化方面来往甚少。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粤港往来才渐渐恢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广泛交往，多方吸引外来技术和投资。港澳成为中国内地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粤港澳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广东与港澳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首先，广东省政府多次派出代表团出访港澳，并接待了多个港澳政府代表团。粤港澳政府部门之间的互访、交流已成为三地政府部门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其次，粤港澳边境管理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广东与香港、澳门分别建立了定期边境会晤制度，通过定期的边境会谈和联络官会晤解决了粤港澳边境管理和出入境方面的许多紧迫问题。粤港方面解决了宝安农民过境生产、双方铁路人员相互出境、“水上新娘”、无证妈妈、广东赴港人员数量控制及内地持双程通行证赴港人员逾期不归等问题；粤澳方面则解决了澳门船只雇佣内地渔工、外流人员遣返、边境地区缉私、口岸建设与管理等问题，保证了边境管理的正常化。再次，三地司法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粤港澳警方经常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高层会晤，商讨打击抢劫、偷盗、走私、贩毒等跨境犯罪活动，曾通过双方或三方联合行动，破获多宗杀人、绑架、抢劫、伪造假币、走私文物等大要案，包括“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澳门回归前，粤澳警方加强对跨境黑社会分子的打击，确保了澳门回归时和回归后的秩序。最后，港澳同胞在广东积极参政议政。许多港澳同胞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港澳回归前，广东也为港澳回归的筹备团体提供了开会议事地点和其他方便。

粤港澳社会文化交往同样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港澳同胞积极捐款捐资发展广东家乡的社会文化事业，香港著名商人霍英东、李嘉诚、曾宪梓、郭得胜、林百欣、郑裕彤等，澳门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何鸿焱等都捐出大批资金，或建学校，或建医院，或赠图书，或改善有关社会文化机构的条件。粤港澳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极为频繁，三地青年、妇女、宗教、劳工、工商等团体往来不断。粤港澳民间交流越来越方便，港澳居民来广东初期主要是探亲访友，随着粤港澳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逐步发展到以经商、渡假、购物等为主。广东居民赴港澳初期也是家庭团聚和走亲戚，后来赴港旅游、工作和经商也占有赴港旅客中相当大的比重。改革开放后，粤港澳之间的通婚现象大幅增多，大量广东女青年嫁给港澳居民成为粤港澳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80年代末期后，广东经济飞速发展，粤港澳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缩小，粤港澳通婚现象呈下降趋势。粤港澳文化交流的发展非常迅速，广东文化与港澳文化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广东加强了与港澳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三地科技人员、高校教师举行会议、学术考察、合作研究等活动持续不断。粤港澳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港澳高校与广东各著名高校建立了密切的校际交流合作关系，演艺界、影视界、文学界、新闻界和体育界的交流合作更是频繁。香港的影视明星、歌星和武侠小说名家在广东城乡几乎家喻户晓，显示出香港发达的通俗文化对广东的巨大影响。

变化最大、发展最迅速的领域是粤港澳经济关系。粤港澳经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展起来，集中体现在广东与港澳在投资、贸易、金融、工业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上。这种合作使广东和港澳均受益非浅。广东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粤港澳经济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同时，与广东省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也是香港、澳门经济维持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

粤港澳投资关系迅猛发展。在1979~1991年，即改革开放探索时期，广东主要是利用

国家以及广东省有关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广东省自身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粤港澳相互之间源远流长的史缘、亲缘关系,吸引港澳商人来粤投资。在这一期间,广东省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广州、湛江两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开放区,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从1979~1991年13年间,广东共签订利用港澳资金合同项目108194宗,协议利用港澳资金209.4亿美元,实际利用港澳资金106.1亿美元,平均每宗利用港澳资金20万美元。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了质的飞跃。同时,广东对港澳投资也进入探索发展阶段,先后在香港、澳门设立了粤海集团、越秀集团、南粤集团等投资型企业集团。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广东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广东省主要通过深化改革,全方位、多层次的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港澳投资,从而使港澳在粤投资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从1992~1997年6年时间,广东省就已签订利用港澳资金合同项目65592宗,协议利用港澳资金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3.44亿美元,实际利用港澳资金也达到了494.28亿美元,平均每宗项目利用港澳资金达到了156万美元。粤港澳投资关系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商品、生产要素、技术以及信息在粤港澳三地间的重新组合配置,形成了以港澳为购销、管理、指挥中心,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的产业一体化的跨地域分工格局,建立了“前店后厂”的合作生产方式。在这一时期,广东省在港澳的投资企业集团,通过重组、业务调整、强化管理、注入资产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部分企业则成功地在香港上市,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不过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广东省对香港、澳门的投资从1997年后,进入了一个相对调整时期。

投资关系也带动了粤港澳贸易的快速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广东省对港澳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的价值和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7年广东与香港、澳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为1020.12亿美元,是1979年进出口总额10.01亿美元的102倍,同时广东省对港澳地区的出口总额一直占广东省对外出口总额的80%以上,从港澳地区的进口额则一直占广东进口额的70%以上。随着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广东省对港澳地区的贸易出口结构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在贸易出口结构中,传统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比重从1978年的48.7%下降到1994年20.8%;而同期的轻纺产品及其工矿产品的出口比重则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1978年的50.5%上升到了1994年的79.3%。广东省对港澳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逐步地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转变到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突破了以往调剂余缺的局限性,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粤港澳三地分享到商品、生产要素、技术、信息流动以及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好处,直接促进了三地的经济发展。

投资、贸易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加强了粤港澳在金融方面的联系与合作。香港、澳门的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广东省设立办事处,开设分行,或直接与广东方面合资设立银行型或非银行型的金融机构。粤港澳金融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为广东省吸引了大量的港澳资本,另一方面也为粤港澳三地的大规模的商品和贸易活动提供结算和融资服务,反过来又促进了粤港澳投资、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港澳对广东的投资以工业领域的投资为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工业合作模式和经济合作模式。这一时期粤港澳工业合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以集中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为主要标志的初期阶段(1979~1983年);2、以发展“三资企业”、确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为标志的腾飞阶段(1983~1989年);3、以重视科技进步,进行工业产品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标志的调整发展阶段(1989~1999年)。

旅游也是粤港澳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些港澳企业家利用广东当地的自然、人文特色开发了一批旅游景点,兴建了白天鹅等一批五星级酒店和众多的星级酒店,为广东省发展现代旅游业奠定了硬件基础。港澳地区还为广东旅游业带来了先进的旅游管理经验,培养了一

大批的旅游专业人才，为广东发展现代旅游业也奠定了软件基础。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港澳同胞 80% 祖籍在广东省，而且港澳同胞的亲属约有 2000 多万人，以及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到港澳旅游的广东人逐年增加，为粤港澳之间发展现代旅游奠定了丰富且稳定的客源基础。粤港澳旅游区内海陆空交通便利，游客甚至可以在一天内游览三地不同的城乡风貌，特别是这个旅游区是世界上唯一跨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具有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综合性旅游区，这构成粤港澳旅游业独有的特色基础。粤港澳三方共同努力，密切合作，充分利用这四个基础，使粤港澳间旅游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粤港澳关系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也经历过不少波折，但它们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关系。源于一体的地缘条件、血浓于水的亲情人缘、几百年来与外敌抗争和改革图强奋斗史缘，独特的岭南文化、海洋文化的熏陶，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一股永不消减的巨大力量，支撑着粤港澳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港澳走向回归的历史阶段，粤港澳关系得到全面、深入的发展。三地经济互相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结合。港澳回归祖国之后，粤港澳三地从三个不同国家管治下的对外关系变为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三个不同体制地区的国内关系。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三地政府在政治上积极协调，顺利实施各种有利于三地发展的政策；在经济上，三地的经济融合正从广度到深度加速发展。粤港澳三地政府已分别组成官方高层协调合作机制“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粤港澳合作已由民间自发形式发展到有三地政府机构、半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结合的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协调合作。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顺利发展。1997 年 10 月亚洲金融风暴波及香港，香港凭籍它的稳固经济基础及内地在金融及贸易上的支持，渡过这一难关。而在港澳的粤资代表性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而陷入困境，经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拨付巨额资金，广东省政府注入优质资产，经过三年多重重组整顿，才恢复正常运行。

世纪之交，粤港澳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益发显示三方进一步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陷入增长放缓、下滑或衰退困境，使得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市场的香港、澳门的对外贸易大受影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使港澳经济外部环境严峻起来，港澳内部经济结构处在加速转型期，结构性失业增多，市场消费疲弱，生产减缩。港人对发展经济信心不足。而内地经济发展迅速，通过探索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路子，科技体制创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广东从“三来一补”的加工基地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基地。广东居民经济生活总体实现小康，珠江三角洲已处在富裕小康水平，全省处在全面建设富裕社会、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广东经济发展更加密切了粤港澳关系，促进了港澳经济的发展。这可以从 1999、2000 年粤港澳旅游业发展情况略见一斑。1999 年由广东省旅行社组团的香港和澳门游人数合共 58.10 万人次，而这一年由广东进出香港澳门的旅客为 13228 万人次；至 2000 年，香港游和澳门游共 86.06 万人次，由广东进出港澳的旅客为 15135 万人次。港澳将旅游业作业龙头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系列产业发展。每年数以几十万人次组团的内地旅客涌到港澳旅游及过亿人次过关(海关)旅客给港澳经济带来很大繁荣。

粤港澳三地都将三地合作发展当作摆脱当前经济困境与进一步开拓的主要依靠，加紧进行。鉴于亚洲金融风暴充分暴露了回归前香港所形成的泡沫经济、在教育科技方面投资不足的问题，从长远考虑，香港不断投放大量资源于人才培育上，以期培训出大量适合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发展带有高增值业务的知识型经济，大力加强香港软件、硬件基础建设，不断改善香港整体营商环境，为今后发展打造良好基础。而在当前来说，增加外贸出口，发展国际旅游，解决及舒缓失业是当务之急。目前特区政府将香港定位在亚洲国际商贸之都上，并且确立了“背靠内地，面向全球”、“提供高增值服务”的发展方向。2001 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给港澳带来巨大商机。香港的现代服务业——金融业、资讯业、国际旅游业、现代物流业、房地产业，正源源不断大规模入粤。董建华代表香港提出粤港建立更紧密的经贸

安排得到内地及广东的支持和参与。粤港澳三地长期合作所形成的兴衰与共、谁也离不谁的格局，正加快向全面经济融合发展。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路程，也是别无选择途径，但它同时可以有力地实现并加快三地经济转型和发展，培育及提升港澳作为国际都的声望、加快大珠江三角洲世界级旅游区和珠江口城市群的建设、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的进程。港澳回归之后，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粤港澳经济合作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粤港澳关系前景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 [1] 刘芳辑：《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 1999 年版。
- [2] 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版。
- [3]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 5 月版。
- [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
- [5] 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 [6]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年。
- [7] 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8] 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 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出版，1995 年。
- [9] 陈昕、郭志坤主编：《香港全纪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10]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 年。
- [11]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 [12] 《广东统计年鉴》，历年。
- [13] 《广东年鉴》，历年。

Relations of Guangdong , Hong Kong and Macao: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eng Qing-shun Lei Qiang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Hong Kong and Macao were par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before Qing Dynasty. After British and Portuguese occupied the two areas,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Guangdong politically, but they kept close relations with Guangdong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When Hong Kong and Macao returned to China,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egan a new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area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Guangdong and Macao History

收稿日期: 2003-02-10;

作者简介: 孟庆顺,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雷强,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

1 本文为《广东省志·粤港澳关系志》的“概述”部分。